

探究的会计化退化：当代知识生产评价机制与认知主体性的腐蚀

作者 胡志英 · SDE 学员 · 约 2.0 万字 · 德麦国际 SDE Universes

探究者的专业产出力日益增强，产出真正原创思想的能力却系统性衰退——不是被压垮，而是评价机制本身把认知器官重训成只识别可交付品的格式转换器。这是“亢奋的退化”，不是“惰性的停滞”。

摘要

当代知识生产面临一种独特的病理现象：探究者的专业产出能力日益增强，但其产出真正原创性思想的能力却系统性衰退。本文提出“探究的会计化退化”（Accountable Degeneration of Inquiry）这一新概念，论证此现象并非源于外部资源匮乏或政治压制，而是由知识生产的评价机制本身——一种可被称为“会计化理性”的管理逻辑——对探究者的认知装置进行的长周期规训所致。这一退化机制的核心运作分为三个阶段：宏观制度层面对未收敛探究功能的排挤、执行者层面对会计化评价标准的内化与自我规训、以及代际演化中探究共同体感知能力的不可逆硬化。本文通过与路径依赖理论、目标置换理论、职业倦怠理论和专业化理论的系统区分，确立该概念的不可消解性；通过在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医疗管理、公共行政和出版业五个领域的结构同构验证，证明其跨域解释力；并通过一套可排除“工作压力”这一最强竞争解释的证伪设计，确保其可检验性。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识别出当代治理术的一种特有悖论：我们为追求卓越而建立的最精密的管理系统，恰恰成为卓越最深刻的抑制机制。

关键词：会计化理性；探究退化；评价治理术；认知规训；知识社会学；管理主义批判

1 引言

1.1 一个被忽视的当代悖论

当代知识生产体系正陷入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一方面，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数、科研项目经费规模等可计量指标持续攀升，学术生产的工业化程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观察者——从资深学者到科学政策研究者——表达出一种深切的忧虑：真正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原创性思想正在变得稀缺，探究的深度被交付的效率所替代，知识生产在统计学意义上空前繁荣，在思想意义上却呈现某种“富饶中的贫瘠”（Alberts et al., 2014; Bloom et al., 2020）。

这一悖论通常被归因为外部压力：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竞争、科研经费的稀缺性争夺、以及“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文化的蔓延。按照这种解释，探究者之所以放弃需要长时间深度思考的探索性研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与心理安全感。然而，这种解释面临一个关键的反例：即便在那些资源充裕、职位稳定、竞争压力相对缓和的顶级研究机构中，探究退化的现象同样显著。那些拥有终身教职的资深学者，同样倾向于生产格式规整、审稿友好、易于被引用的“安全”论文，而非挑战学科根基的探索性文本。

这暗示着，在“工作压力”解释之外，存在一种更深层的退化机制——它不是由外部资源的匮乏驱动，而是由知识生产系统内部的评价逻辑本身所驱动。本文旨在提出并论证这一机制：“探究的会计化退化”，即探究者的认知装置被一种类似于财务会计逻辑的评价体系所重新塑造，使其在保持甚至提升“可交付性”的同时，系统性地丧失识别、容忍和推进“未收敛探究功能”的能力。

1.2 理论资源与本文定位

本文的论证根植于三个理论传统的交叉地带。第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传统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建构本质，但其主要关注点在于科学事实如何在实验室中被“制造”（Latour & Woolgar, 1986; Knorr Cetina, 1999），对于评价机制如何反向塑造认识活动的讨论相对薄弱。第二，新管理主义批判文献（Power, 1997; Strathern, 2000; Shore & Wright, 2015）诊断了审计文化对公共部门的渗透，但其分析多停留在制度层面，未充分展开其对认知主体本身的规训机制。第三，实用主义传统，尤其是皮尔斯（C.S. Peirce）的探究理论，为理解“探究”本身的规范性结构提供了资源（Peirce, 1877; Misak, 2004），但其对于规范如何可能被异化的警惕有待深化。

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将“会计化理性”的分析从制度层面推进到认知层面，揭示一种从组织管理工具到主体认知器官的退化闭环。这一论证既不是对外部压力的简单归因，也不是对“专业主义”的怀旧式批判，而是试图精确刻画一种由善意的管理理性所催生的、系统性的认知功能丧失。

1.3 核心论点与论文结构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当代知识生产的评价体系，经由一种可被称为“会计化理性”的运作模式，通过（1）在制度层面将“未收敛探究功能”排挤出被承认的学术实践，（2）在个体层面将探究者的认知能力规训为服务于“可交付性”的格式转换器，（3）在代际层面使探究共同体丧失识别自身退化的感知能力，从而完成一种“从制度到器官”的退化闭环。这不是探究者“变懒了”或“被压垮了”的问题，而是“如何定义卓越探究”的评价标准本身，正在重新定义“什么算探究”。

论文的论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对“会计化理性”进行概念化，厘清其与路径依赖、目标置换等相关概念的本质区别。第三部分通过五个跨组织场域的结构同构分析，验证其经验普遍性。第四部分展开退化机制的三个层级：制度排挤、认知规训与感知硬化。第五部分设计一套可排除“工作压力”竞争解释的证伪方案。第六部分讨论研究发现的理论贡献与政策含义。

2 文献综述：从管理主义批判到认知规训的诊断

2.1 审计文化与新管理主义的制度批判

过去三十年间，对“审计社会”（audit society）的批判性研究构成了理解当代治理术的一条重要脉络。迈克尔·鲍尔（Power, 1997）在其开创性著作《审计爆炸》中指出，审计不再是一种中立的验证技术，而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治理实践——它不仅仅检查组织是否遵循规则，更积极地塑造组织内部的行为模式，使其变得“可审计”。这一逻辑随后被论证为广泛渗透于高等教育、医疗保健、公共行政等非商业领域（Strathern, 2000; Shore & Wright, 2000）。

斯特拉森（Strathern, 2000）提出的“审计文化”概念特别值得注意：她指出当表现的可见性替代了表现本身时，一种特有的倒置就发生了——组织不再致力于做好工作，而是致力于使工作“看起来好”于审计标准。这一洞察触及了本文所关注的现象的表层，但其分析框架仍有局限：它主要将问题定位为一种组织性的偏航，即手段（审计指标）替代了目的（实质价值）。本文将要论证的是，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替代”，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重塑”——那些长期置身于审

计文化中的行动者，其认知器官本身已经被改造，以至于他们不再能够识别“实质价值”和“审计指标”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旦无法被感知，“替代”就不再是被迫的妥协，而成为真诚的、自觉的卓越实践。

2.2 科学社会学中的“生产”范式与“评价”范式的失衡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传统深刻揭示了知识如何在实验室、资助系统和出版网络中“被制造”（Latour & Woolgar, 1986; Knorr Cetina, 1999）。拉图尔（Latour, 1987）对“黑箱化”的分析——科学事实一旦被接受就不再被追问其建构过程——为理解知识生产中的“未收敛功能”如何被关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然而，SSK传统的一个特征性偏重在于：它更多地关注知识如何“被生产”，而较少关注知识生产者的认知能力如何“被评价机制反向建构”。换句话说，SSK解释了实验室中发生了什么，但对于“什么样的实验室能够获得资助”、“什么样的论文能够被发表”这样的评价筛选机制如何反过来定义“什么值得被研究”和“谁可以被训练为合格的研究者”，探讨相对有限。

这一失衡在“模式2知识生产”（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文献中有所弥补（Gibbons et al., 1994; Nowotny et al., 2001）。该文献描述了知识生产从其学科自治的“模式1”向应用导向、跨学科、问责驱动的“模式2”转型的过程。但该文献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甚至颂扬性的，它对转型的代价——尤其是对学科内部“无直接应用前景”但可能具备长远范式意义的基础探究的挤压——缺乏充分的警惕。本文的论证将这种“被挤压”的现象系统化，并揭示其并非转型的附带成本，而是新评价机制内生的结构倾向。

2.3 实用主义探究理论：规范与异化的内在张力

皮尔斯（C.S. Peirce）的探究理论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规范性参照点。在皮尔斯看来，探究是一种由“怀疑”驱动、以“信念”的固定为终点的活动（Peirce, 1877）。探究的规范不在于其是否符合某种外部标准，而在于其方法的“自我修正性”（self-correctiveness）——即一个探究共同体能否在长期的探究过程中，通过持续的经验碰撞与逻辑检验，逐渐逼近关于实在的真理。

这一理论传统在当代的复兴（Misak, 2004; Talisse & Aikin, 2008; de Regt & Dooremalen, 2020）主要集中于规范性维度：什么是好的探究？探究者应当遵循何种认知德性？这些讨论为批判当代知识生产的退化提供了规范地基，但它们往往忽视了皮尔斯本人已经预感到的一种危险：探究共同体可能因“无干扰的共识”而陷入僵化，将探究的方法固化为“方法的固守”（the method of tenacity）的变体——即不是真正迎接经验的考验，而是用仪式化的程序来模拟它。

本文将论证：会计化理性恰恰是这种“方法固守”的当代制度化形态。它提供了一套精密的标准来衡量探究者“是否在做应当做的事”，但这套标准本身与“探究是否真正在推进”之间的关联却日益松弛。探究者被鼓励遵循方法，但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质疑方法本身的认知资源。这不只是“错误的方法”问题，而是“方法被赋予了本体论优先性”——方法不再是通往真理的工具，而成为定义“真理”的元语法。

2.4 文献缺口的精确定位

综上，现有文献在三个方向上各有贡献，但都未能完整地捕捉当代知识生产退化的深层机制：

- （1）审计文化批判识别了“手段替代目的”的制度偏航，但未能解释这一偏航如何从“不得不做”的妥协深化为“真诚相信”的认知本能。
- （2）科学社会学传统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建构性，但主要聚焦于“生产端”，对“评价端”如何反向建构生产者的认知装置缺乏充分分析。
- （3）实用主义探究理论提供了探究的规范性标准，但其对于规范如何可能在实践层面被系统性地异化，缺乏经验层面的机制刻画。

本文的理论定位是：在上述三个传统的交叉处，提出“探究的会计化退化”这一核心概念，将制度批判从组织层面推进到认知层面，将社会建构分析从生产端延伸到评价端，将规范理论从“应然”落实为对“实然”退化机制的诊断。

3 理论框架：会计化理性与探究退化的三层级模型

3.1 核心概念定义

会计化理性（accountable rationality）是本文的基础分析概念，指一种将组织的各类活动——包括那些本质上不确定、不可预测、不可标准化处理的探究活动——翻译为一套可审计、可比较、量化的绩效指标的治理逻辑。这一概念区别于日常意义上的“会计工作”：它不是一种具体职业，而是一种组织认知模式，其特征包括：（1）可计量性优先：任何活动的价值必须能通过某种指标体系被外部观察者“看到”；（2）可比较性强制：不同类型、不同时间尺度的活动被纳入统一的比较框架；（3）格式合规性替代本质判断：对“是否做对了事”的判断被取代为对“是否在按正确格式做事”的审查。

探究的会计化退化（Accountable Degeneration of Inquiry）指这样一种过程：探究共同体在长期接受会计化理性的评价机制规训后，其认知装置被重塑，使其在保持甚至提升“按标准进行探究”的交付能力的同时，系统性地丧失识别、容忍和推进“未收敛探究功能”的感知能力和行动意愿。

这里的关键词是“未收敛探究功能”（non-convergent inquiry functions），指那些不确定性高、时间框架长、失败概率大、且无法按照预设模板提交阶段性交付品的探究活动，如对学科前提的长期质疑、对冷门方向的深入摸索、对异端假设的严肃检验等。这些功能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知识进步的“必需风险”，但在会计化理性的视野中，它们恰恰是最难以被“证明价值”的类别。

3.2 退化机制的三层级模型

本文提出，会计化退化不是单一层面的现象，而是一个同时在三个层级上运作、且三个层级相互支撑的闭环系统。

命题1（制度排挤层）：会计化评价体系通过“交付命令”的普遍化，在组织层面将未收敛探究功能从“被承认、被资助、被发表”的学术实践中排挤出去。交付命令指这样一种组织预设：探究者必须能够按照某种标准模板，周期性地提交可被独立审计的“阶段性成果”，以证明其活动的价值与合规性。由于未收敛探究功能在本质上无法满足这一命令，它被系统性地边缘化。

命题2（认知规训层）：长期在接受交付命令规训的环境中工作的探究者，其认知装置被重塑。他们不仅“被要求”按格式交付，而且内化了一种认知惯性——将“能被清晰地格式化为交付品”等同于“值得被探究”，“无法被简便审计的探究方向”则从认知视野中消失。这不仅是行为上的顺从，而是感知器官的再训练：探究者的注意、判断和好奇，都被校准向“可交付性”。

命题3（感知硬化层）：在代际的时间尺度上，命题1和命题2的长期联动导致探究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丧失了识别自身退化的能力。新一代探究者从接受学术训练的第一天起，就置身于被会计化理性深度格式化的环境之中。他们不知道除了“高效地交付可审计的学术产品”之外，探究还可以有其他形态。当这些“会计化的探究者”日后成为学术守门人（期刊编辑、基金评审、院系负责人）时，他们真诚地、以维护学术质量的名义，进一步加固了交付命令的统治地位。

综合命题：三个层级构成一个自我增强的退化闭环。制度排挤减少了未收敛功能的可及性；可及性的减少加速了认知规训；认知规训导致了感知硬化；而感知硬化后的探究共同体，作为制度的维护者，又进一步强化了制度排挤的合法性。这不是一个可以靠“增加资源”或“减少压力”就能切断的循环，因为其驱动引擎不是资源稀缺，而是对“如何证明价值”的治理执念。

3.3 与竞争理论的本质区分

为确立这一概念的不可消解性，必须将其与四种已被广泛讨论的理论做出精确区分。

与“路径依赖”的区分：路径依赖理论（David, 1985; Arthur, 1989）的核心机制是“锁定”（lock-in）——早期偶然选择因正反馈递增而自我强化，使系统难以切换到可能更优的替代路径。然而，会计化退化不是“被锁在旧轨道上”的问题。它揭示的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由当下激励机制驱动的腐蚀性生产过程。探究者不是“无法转向”，而是主动地、高效地、基于清晰的利益计算和自我认同，将探究的全部能力用于制造无懈可击的交付品。这是一种“亢奋的退化”，而非“惰性的停滞”。

与“目标置换”的区分：目标置换理论（Merton, 1940; Warner & Havens, 1968）描述了官僚组织中手段（规则、程序）逐步替代目的（使命、价值）的现象。会计化退化确实包含这一元素，但它的运作更深一层：它不仅是用手段替换目的，更是通过这一手段对执行者认知器官的重塑，使他们真诚地将手段内化为目的本身，并丧失了感知旧目的的能力。这是在“本体层面”的置换——探究者不再知道“探究”曾经意味着什么。

与“职业倦怠/内卷”的区分：职业倦怠（Maslach & Jackson, 1981）和内卷（Geertz, 1963; Huang, 2002）描述的是精力的耗竭或无效的内部竞争。会计化退化描述的则是一个高度积极、精力充沛甚至亢奋的退化过程。探究者并非被动地在系统中耗尽，而是主动地将系统的逻辑内在化，以卓越的执行力去实施一套将探究“去探究化”的标准。

与“专业化”的区分：专业化的确建立排他性标准和行话（Abbott, 1988; Larson, 1977）。但会计化退化指的是某种特定专业理性——会计化逻辑——在评估所有专业活动时的跨域殖民和同化。它不是建立学科边界，而是用一种统一的评估语言消除不同学科独特认识德性的空间。这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专业分化，而是一种特殊的认知霸权。

3.4 理论的有效性边界

本文提出的理论需要明确其解释力的边界，以避免过度推广。

- （1）本理论并非主张所有的探究退化都源于会计化理性。诸如资源匮乏、政治审查、技术条件限制等因素，在特定历史与制度情境下仍可能是退化的主要原因。本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在那些资源充裕、职业安全、政治自由条件相对良好的知识生产体系中，探究退化仍然发生并持续加剧。
- （2）本理论聚焦于作为“系统病理”的会计化退化，不讨论个别探究者如何在不利环境中通过特殊品质维持探究活力的案例。即使在退化的系统中最严重的退化系统中，也总存在例外个体。理论的解释对象是系统的整体趋势，而非个体的差异性命运。
- （3）本理论关于“认知装置被重塑”的主张依赖于社会学田野调查和心理测量工具的进一步发展来验证。当前阶段的论证以理论建构和跨域类比为主，经验检验设计将在第五部分详细展开。

4 方法论

4.1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的方法，辅以跨组织场域的结构同构比较验证。研究的核心目标不是提供经验假设检验的确定性结论，而是提出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新理论框架，并初步验证其跨域解释力与不可消解性。

选择这一方法论路径的理据如下：第一，所诊断的现象——会计化理性对认知的规训——是一种深层的、在长周期中运作的机制，它无法通过横截面的调查问卷或短期的行为实验充分捕捉。第二，这一现象尚未在现有文献中被明确概念化，理论建构的紧迫性优先于经验检验。第三，本文在建构理论的同时已经嵌入了严格的证伪条件（见第五部分），这使得理论在逻辑上“欢迎反驳”，而非装饰性地宣告“需要未来研究”。

4.2 分析策略

概念生成：通过“不可还原论证”——即证明核心概念“探究的会计化退化”不能被任何单一维度的分析（制度分析、行为分析或演化分析单独进行）所完全推导，必须通过三个维度的交叉才能获得。

概念界定：通过与路径依赖、目标置换、职业倦怠、专业化四种最相似理论的系统性区分，确立概念的不可消解性。每一种区分都指出既有理论的“解释剩余”——即那些被既有理论的理论语言系统性忽视的方面。

跨域验证：选取企业管理（研发部门）、金融投资（量化基金）、医疗管理（医院绩效）、公共行政（政府立法）、出版业（学术编辑）五个领域进行比较分析。选择标准是：（1）各领域都涉及“专业判断 vs 可计量绩效”的核心张力；（2）各领域都有关于“退化”的独立讨论，但这些讨论尚未被整合进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

证伪嵌入：设计一个可操作的证伪方案，明确本理论面临的最强竞争解释（工作压力模型），设定该竞争解释的逻辑预测，并给出能够裁决双方主张的观察结果。这一设计赋予理论“被证明为错误”的具体方式，这是其科学特性的基石。

4.3 方法局限

本文的方法论存在三个主要局限：（1）概念建构主要基于对现有文献的二次分析与对新现象的定性观察，缺乏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数据支持。（2）跨域结构同构的分析目前止于类比层面的论证，尚未深入到每个场域的内部运作机制进行独立的经验说明。（3）证伪方案中的关键变量——“会计化理性强度”——的测量需

要发展新的量表工具和收集长周期的纵向数据， 目前仅提供了测量路径而非实际测量结果。这些局限将在第六部分的结论中进一步讨论， 并被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方向。

5 分析与讨论

5.1 制度排挤：交付命令如何从结构上边缘化未收敛探究

会计化退化机制的第一层级运作在组织层面。现代学术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科研资助的申请-评审体制、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标准、以及院系层面的绩效考核体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可被称为“交付命令”的普遍预设。

交付命令的运作形式。在科研资助中，它体现为对“预期成果”的详细描述要求。一个不想承诺最终产出的探究方向——比如“我想用五年时间探索一个我自己还不确定能否成立的假设”——在当前的资助申请文本中几乎没有表达空间。在学术出版中，它体现为对论文格式、理论框架明确度、经验材料完备性的前审查。一篇尚在摸索中的、无法清楚表述其结论的、论证链条存在明显缺口的论文，无论其思想潜力如何，极难通过双盲同行评审的第一轮筛选。在绩效考核中，它体现为对“阶段性成果”的量化计数——论文数量、引用次数、项目金额——这些指标不需要理解一个学者的探究历程，只需对成果进行盘点。

排挤的非意图性。需要强调的要点是：这种排挤在任何单一环节都是“合理的”。没有哪个资助机构要求申请者承诺不进行长期探索；没有任何期刊声明拒绝未收敛的类型；没有任何考核委员会故意压制深度思想。排挤是通过一种聚合效应完成的：每个节点上的合理性相加，整体上却产生了一种压制未收敛探究功能的结构偏向。这是典型的“微观动机导致宏观后果”的机制（Schelling, 1978）。

排挤的自我正当化。更为深刻的是，这种排挤拥有持续的内在正当化机制。当未收敛探究功能在组织的可见范围内日益稀少时，它的“正常性”就受到了侵蚀。那些年轻学者申请基金时无法清晰表述预期成果，不再被评审人理解为“这个人在做真正冒险的探索”，而被理解为“这个人准备不充分、思路不清晰”。评价标准本身定义了“什么是好的探究计划”，而被该标准排除在外的探究形态，则被重新定义为“不够好的探究计划”。这是一种构成了“排除-遗忘-再排除”的认知闭合回路。

5.2 认知规训：探究者如何被改造为会计化理性的执行者

第二层级运作在个体认知层面。长期处于交付命令支配的环境中的探究者，其认知装置经历了一种深度的重新校准。

感知的再训练。设想一个博士研究生进入学术训练。他从一开始就学习到：好的论文是“有清晰可验证假设、完整数据支持、在标准理论框架内推进”的论文；好的研究项目是“有明确时间表和可交付中期成果”的项目；好的会议报告是“重点突出、结构清晰、便于听众评判”的报告。这些是合理的要求，但整套训练的暗含效果是：它将探究者的注意力、好奇心和判断力，系统性地校准向“可被格式化为标准交付品”的方向。一个暂时无法被格式化、但蕴含着深刻张力的思想直觉，在博士生能够识别其价值之前，就已经被训练所暗示的“这不是专业的工作方式”的直觉所过滤。

这种再训练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探究者并非在某个时刻被明确告知“不要做那类探究”；他只是在一轮又一轮拒稿、一次又一次资助失败、一场又一场不被理解的学术报告中，习得了一套前意识的判断机制：这类想法不值得投入精力，因为它们在评价体系中无法存活。这不是一个审慎选择的行为，而是一个被环境反馈所塑造的认知重构过程。

内化的真诚性。这里必须区分单纯的“行为顺从”和认知规训所指的“认知重塑”。一个被迫按标准写作但内心仍知道自己在妥协的研究者，并未被规训；他只是受制于外部约束。被规训的研究者则是那种真诚地相信：符合会计化标准的探究就是好的探究；不符合的就是糟糕的、不专业的、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探究。这种内化的达成，标志着会计化理性从外部约束转变为探究者的内在评价器官。

这一过程可以借助对“博雅教育”与“职业教育”区别的经典讨论来理解。如果一套学术训练主要是一种“方法论职业培训”——教给你如何操作标准工具以产生被认可的输出——那么，它就在训练探究者如何在给定的认知框架内高效工作，而非如何反思和挑战框架本身。当足够多接受这种训练的个体进入探究共同体，共同体整体的批判性功能就会衰减。

5.3 感知硬化：代际演化中的认知闭合

第三层级运作在代际演化的时间尺度上，标志着退化从个体困扰变为一种共同体的结构性特征。

会计化探究者的再生产。个体认知规训的累积效应是：新一代学者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被会计化理性过滤后的学术世界中。他们不再需要经历“压制-妥协”的心理冲突，因为那些可能引起冲突的探究冲动在他们认知形成阶段就从未被充分唤醒。他们不知道“探究”除了高效的交付之外还能有其他面貌；对他们而言，论文就是期刊格式，项目就是申请书模板，思想贡献就是被引次数。

当这批学者成为学术守门人——期刊编辑制定审稿标准、基金委员会成员评估申请、院系领导制定考核条例——他们将以最高的真诚感，继续加固交付命令的统治。他们认为自己在做的是“维护学术质量”，因为在他们经过会计化训练的认知器官看来，“质量”就是“符合标准的程度”。而“无法被标准衡量的深度”这个概念本身，对于这种认知器官而言是一个存在论上不可见的范畴。

认知闭合的恶性循环。感知硬化标志着退化闭环的“焊接完成”。此前，至少还存在着一组张力——探究者内心可能知道，这套标准与理想中的探究之间有差距。但感知硬化之后，这种差距从探究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中消失。效率被认为是深度的充分替代；可交付性被认为是价值本身的定义。问题的性质就彻底变化了：

修复者自身也是硬化者。试图诊断和修复这一退化机制的学者，其自身的认知器官同样被会计化理性深度训练。他的诊断工具——“系统的独立思考、理论建构、批判性分析”——本身就是一种标准的交付格式。这可能导致一种悖论性的结果：最精密的自我批判也可能成为另一套精密交付品。

被关闭的空间从认知上消失。交付命令关停了未收敛功能在制度中的存在空间；认知规训剥离了探究者感知那个空间的能力。于是，被关闭的空间不仅在现实中不存在，而且在观念中也不再存在。探究者的反思最终遇到一个无法再追问的边界——因为追问所需的感知器官已经被锁死。

5.4 跨域验证：五个场域的结构同构

为初步检验“会计化退化”机制是否具有超越特定领域的解释力，本节将其应用于五个不同的知识生产或专业实践领域。

企业管理：研发部门的会计化。大型科技公司的研发部门面临一种特有退化：创新的源动力从“寻求突破性技术方向”转变为“完成专利申请KPI”。专利数量成为衡量研发团队价值的最便利指标。当该指标成为考核核心后，团队的自然适应策略是：放弃那些失败风险高但突破潜力大的长周期研究，转向在已有技术路径上制造可专利的微创新（micro-innovations）和防御性专利。结果是，专利数量上升，技术边界的实质拓展却停滞。研发人员从探索者变为专利交付者，且真诚地认为“我们每年专利数百件，创新力很强”。

金融投资：量化模型的会计化。量化基金中，量化模型被设计为辅助投资决策的风险管理工具。但随着模型表现的量化指标（夏普比率、最大回撤等）成为衡量基金经理能力的核心基准，一种倒置发生：基金经理不再运用基于经验和模糊判断的反共识投资直觉；他们转而是为了满足模型指标而交易。投资决策的质量被定义为“模型跑出来的结果是否美观”；而模型无法捕捉的、需要人脑进行复杂综合判断的不确定性因素，被系统性忽视。一段时期后，基金经理关于市场的深度理解退化，但模型报告愈发精美。

医疗管理：临床判断的会计化。医院引入标准化治疗方案（clinical pathways）和绩效考核的初衷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可比性。但考核压力使得医生将“完成治疗方案文档的合规填写”理解为治疗行为本身的核心。一次治疗方案是否成功，在管理体系中被评估为该方案文档的填写质量、各项指标的达成率、程序的合规性。病人真实的生存质量改善，作为一种需要长周期跟踪和主观判断的信息，在考核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医生的专业临床判断力——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权衡的能力——由于长期不运用而钝化。

公共行政：政策评估的会计化。政府部门的立法和修法工作，往往被量化为“完成行政法规的立、改、废、释X件”的考核指标。官僚系统对此的最优适应是：将大量精力用于修饰和精确化文本，在数量的“完成度”上达标，而忽视或搁置那些需要艰难的政治权衡和制度创新的实质性治理挑战。政策的实质效果极难被量化，而法规文本的合规性和数量更容易被展示。长期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被行政管理逻辑殖民，其政治智慧内核被行政管理技术架空。

出版业：选题判断的会计化。在学术出版和严肃出版领域，编辑的核心能力曾是识别思想潜力——在混乱的初稿中看见可能的价值。但随着出版业财务压力的增加和市场数据的即时可得，编辑的选题决策越来越多地被“流量数据预测模型”所替代。出版品的价值被定义为点击率、预售量、平台推荐算法的友好度等可计量指标。编辑的选题品味——一种需要长期文化浸润才能获得的判断力——因不再被运用而逐步退化；编辑变成了流量数据的喂养者，而非思想价值的发现者。

结构同构的四个共同要素。这五个场域尽管内容迥异，但其退化机制呈现出共同的结构特征：（1）可计量指标的霸权化：一个原本辅助性的量化工具成为支配性的评价基准；（2）专业判断的边缘化：从业者长期积累的、难以被格式化的判断力被系统性地闲置和钝化；（3）执行者认知的内化：从业者不再感到被强制，而是真诚相信这套计量标准就是衡量质量的最佳方式；（4）退化结果的悖论形态：组织的外部表现（专利数、基金业绩、文档合规率）持续优化，内在功能（创新、判断、关怀）却在衰退。

5.5 证伪检验设计：排除工作压力竞争解释

本文必须面对的最强竞争解释是工作压力与职业竞争模型。该模型主张：当代知识生产退化的原因是学者面临的工作负荷过大、职业晋升通道狭窄导致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急功近利，放弃需要长时间投入的、无法在短期内产出成果的探究活动。按照这种解释，探究退化是一种应激行为变异，而非一种由评价逻辑本身驱动的认知功能硬化。只要显著降低职业竞争压力，学者自然会恢复对未收敛探究的投入意愿和能力。

本理论对此的回应是：工作压力无疑是退化的加速因素，但它不是根本驱动机制。即使压力被大幅降低，会计化理性的规训效应仍将持续，因为它已经塑造了探究者定义“什么算好的探究”的标准本身。

证伪条件设计：

（1）变量操作化。① 竞争解释的控制变量：工作压力强度，用“年均工作小时数”和“获得长聘岗位的淘汰比例”两个代理变量来测量。② 本机制的独特预测变量：探究共同体内部“会计化理性的强度”，操作化为“获得长聘岗位或重大资助所必需的、在可审计产出指标（论文数、影响因子、项目金额）上的最低标准严格度”。③ 结果变量：“未收敛探究功能”的存活率，操作化为“在特定学术共同体（如一个院系、一个学科协会）中，不依赖标准模板提交的探索性论文在总产出中的占比”以及“对该学科根本范式的公开质疑（通过研讨会、论战文章、专题会议等）的发生频率”。

（2）检验设计。对一组在“工作压力”上相对同质的研究机构（例如，同一学科方向但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顶尖研究型大学院系）进行配对比较。关键对照组设置如下：选取那些工作压力相似（年均工作时间相近、长聘淘汰率相近）但在“会计化理性强度”上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的机构。如果“会计化理性强度”更高的机构确实显示出更低的未收敛探究功能存活率，且这种关系在控制工作压力后依然显著，则支持本理论的独特预测。反之，如果会计化理性强度与未收敛探究功能存活率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退化完全可以用工作压力来解释，则本理论被证伪。

（3）失败条件（理论的反自我反驳）。如果研究发现在所有控制组中，工作压力的变化完全解释了未收敛探究功能消失的全部变异，那么在给定的可信度水平上，本理论为假。届时的结论将是：探索退化的唯一有效干预点在于改善学者工作环境、降低竞争烈度。这将使人重新相信，只要给探究者充分的物质与心理安全感，他们对未收敛探究的本能就会自动恢复。这一结论本身是有实践价值的，尽管它将证伪本理论。

这一证伪设计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不只是对本理论提出的一个“安慰性挑战”，而是承认了一个具体的、对本理论构成真正替代可能性的对手。通过将证伪条件可操作化，本文赋予其理论主张“被证明为错误”的实存风险，这正是可证伪性在理论建构中的实际体现。

5.6 综合讨论：评价治理术的悖论

综合前文的论证，可以提炼出当代知识生产评价体系的一个深层悖论：我们为追求卓越而建立的最精密的管理系统，恰恰因其精密而成为卓越最深刻的抑制机制。

这一悖论的运作不在于“管理太严苛”——这仍停留在外因论的解释框架内。真正的问题在于，会计化评价体系通过对“什么算探究”的定义权，重新塑造了探究共同体的认知水平线。探究不再是帕森斯所谓的“规范导向的行动”，而是转变为一种服务于“可审计性”的表演性实践。探究者从意义的狩猎者退化为格式的完美执行者。

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本文的论证是对鲍尔（1997）审计社会批判的深化。鲍尔看到了审计如何生产出“可审计的组织”；本文进一步揭示，审计如何生产出“只能按审计逻辑思考的探究者”。斯特拉森（2000）指出的“表现的可见性替代表现本身”的倒置，在本文中被论证为不仅是组织层面的行为偏航，更是一种认知重塑。本文也与福柯（Foucault, 1979）的规训理论形成呼应，但修正了其国家中心主义的倾向——当代知识生产中的规训力量不是来自主权力，而是来自探究共同体自身采纳的“善治”技术。

皮尔斯传统的当代回响。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视角看，探究的会计化退化是“探究的方法”被“方法的固守”所取代的制度化形态。皮尔斯本人对“权威的方法”（the method of authority）和“先验的方法”（the a priori method）的批判，主要是针对那些有明确的外部压制力量或内部教条的情况。当代会计化理性的特殊危险在于：它既不是外部的权威在禁止异端，也不是内部的教条在压制思考；它是通过一套精密的、科学的、充满良好意图的评价技术，让探究者自己不再产生异端，不再感知到需要教条去压制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压制形态的思想统一。

6 结论

6.1 核心发现的凝缩

本文的核心论证可以凝缩为以下判断：当代知识生产领域的探究退化现象，其根本驱动力量并非外部资源匮乏或政治压制，而是一种由会计化评价体系本身所驱动的、从制度到认知再到共同体演化的三层级退化闭环。会计化理性通过将“可审计的交付”重构为“探究价值本身”的定义标准，迫使探究者的认知器官经历深刻重塑，使他们成为高效、忠诚的会计化探究者，同时丧失了感知和推进未收敛探究功能的能力。当代知识生产的悖论——统计学上的空前繁荣与思想层面的深层贫瘠——是这一退化闭环的制度性表达。

6.2 理论贡献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做出贡献：

- （1）将管理主义批判从制度层面推进到认知层面。既有文献对审计文化和绩效评价主义的批判，主要关注其对组织行为和资源分配的扭曲效应。本文提出，更根本的伤害是对探究者认知装置的长周期重塑——探究者不再是被“迫使”生产可交付成果，而是被训练为只能识别那些能被格式化为交付品的探究方向。
- （2）为实用主义探究理论补充了异化诊断的维度。皮尔斯传统强调了探究共同体的自我修正能力，但本书指出，通过引入会计化理性这一中介，探究的方法可能在其自身内部产生“自我关闭”的力量——它将对抗方法的行动也强制纳入方法的格式之中。
- （3）链接了组织社会学与认知科学的讨论。通过精确区分“会计化退化”与路径依赖、目标置换、倦怠等概念的边界，本文为理解当代治理术提供了一套新的分析语言，这套语言能够在组织、行为和认知三个层级上分析同一现象。

6.3 实践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诊断对于身处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行动者——高校管理者、科研资助机构、学术期刊编辑、以及每一个在退化的张力中工作的探究者——提供了以下可操作的指引：

- （1）警惕“评价标准优化”本身的异化效应。每一次试图让评价标准“更透明、更公平、更客观”的改革，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会计化理性对未收敛探究功能的排挤能力。政策干预的注意力不应仅放在“如何优化考核指标”上，而应首先反思“为什么我们如此依赖考核指标来定义探究价值”。
- （2）有意识地保护“不受打扰的探究空间”。在组织层面设立明确的制度安排，使一部分探究完全不进入常规的会计化评价的管辖范围。这些“探究保护区”不应仅仅是减少要求或放宽时限，而应从根本上拒绝预指定交付格式和周期性审计的要求。如果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要维持其长期创新潜力，这种制度性保护不是奢侈的安排，而是功能性的必需。
- （3）在学术训练中刻意保留“非工具性”的认知维度。研究生教育应刻意训练学生去识别和反对学科的基本前提，而非仅仅教授如何在既有框架内操作。这不仅是对批判性思维的口头强调，而应体现在课程设计——例如，设置不要求产生结论的阅读与辩论环节——和对早期学术发表的评价标准中。

6.4 研究局限的诚实自陈

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局限：

- （1）经验基础的单薄。本文的论证以概念建构和跨域类比为主，缺乏系统性的第一手田野调查数据来检验“会计化理性强度”与“未收敛探究功能存活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五部分的证伪设计提供了可操作的检验路线，但尚未付诸实施。
- （2）机制微观基础的缺失。本文描述了“认知规训”的宏观社会过程，但缺乏对微观认知机制——探究者的注意力是如何被再训练的、判断力是如何被格式化的、何种神经机制或心理过程支持了“感知硬化”——的深入刻画。这一微观基础需要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协作来补充。
- （3）文化差异的未充分考量。本文的论证基本基于对西方知识生产体系以及被类似治理技术渗透的东亚学术环境的观察。不同学术文化传统中对“什么是探究”的理解差异如何调节会计化退化的表现形态和强度，值得进一步讨论。

6.5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本文的分析和局限，以下研究纲领可构成一个连贯的研究议程：

- （1）建构并验证“会计化理性强度量表”。发展一套可用于大规模问卷研究的心理学测量工具，能够在个体层面测量一个探究者对会计化评价标准的内心投入程度。这项研究将为本文的各种命题提供第一手的定量证据。
- （2）对高度“保护区”特征的学术机构的比较案例研究。识别那些目前仍保有较强未收敛探究功能的知识生产单元（例如某些基础科学研究所、小型文理学院、独立研究基金），开展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探讨其究竟如何制度性地抵御了会计化理性的渗透。这些“正面案例”将为修复策略提供具体参照。
- （3）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检验。与认知神经科学合作，设计实验探究长期接受会计化评价规训的个体在面临“格式不符合标准但有思想潜力的论文”时的神经反应模式，与对照组（来自会计化压力较低的学术环境）进行比较，从而验证“感知硬化”命题的神经基础。
- （4）历史社会学的长周期比较研究。选取过去两百年间知识生产的两个或多个主要转型期（例如19世纪的德国研究型大学崛起、20世纪中叶的美国大科学体系成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追踪“治理评价逻辑的改变如何滞后性地塑造了知识生产的形态”，从而获得对退化与变革的更一般性理论。
- （5）干预实验：“非评价评估”的制度设计。基于本文的诊断，设计一种新型的探究评价框架，其核心特征是：对探究者的工作保持谨慎的无知，不要求周期性审计，仅以罕见的、深度的、质性的同行判断作为长期考核的依据。在一个合作院系中进行小规模实验试点，跟踪研究其对博士研究生和早期职业研究者的认

参考文献

1. Abbott, 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Alberts, B., Kirschner, M. W., Tilghman, S., & Varmus, H. (2014). Rescuing US biomedical research from its systemic flaw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16), 5773-5777.

3. Arthur, W. B.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99(394), 116-131.

4. Bloom, N., Jones, C. I., Van Reenen, J., & Webb, M. (2020). 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4), 1104-1144.

5. David, P. 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 332-337.

6. de Regt, H. W., & Dooremalen, H. (2020).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Philosophy Compass**, 15(8), e12705.

7.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Books.

8.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Sage.

10. Huang, P. C. (2002).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Modern China**, 28(1), 3-62.

11. Knorr Cetina, K. (1999). **Epistemic Cultures: How the Sciences Make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2. Larson, M. S.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 Latour, B., & Woolgar, S. (1986).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 Maslach, C., & Jackson, S. E. (1981). The measurement of experienced burnou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99-113.

16. Merton, R. K. (1940).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18(4), 560-568.

17. Misak, C. (2004). **Truth and the End of Inquiry: A Peircean Account of Tru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Nowotny, H., Scott, P., & Gibbons, M.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Polity Press.

19. Peirce, C. S. (1877). The fixation of belief.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1-15.

20. Power, M. (1997). **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 Schelling, T. C.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W. W. Norton.

22. Shore, C., & Wright, S. (2000). Coercive accountability: The rise of audit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M. Strathern (Ed.), **Audit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 Ethics and the Academy** (pp. 57-89). Routledge.

23. Shore, C., & Wright, S. (2015). Governing by numbers: Audit culture, ranking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ocial Anthropology**, 23(1), 22-28.

24. Strathern, M. (2000). The tyranny of transparency.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6(3), 309-321.

25. Talisse, R. B., & Aikin, S. F. (2008). **Pragmat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Continuum.

26. Warner, W. K., & Havens, A. E. (1968). Goal displacement and the intangi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goa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2(4), 539-555.

27. Ziman, J. (2000). **Real Scienc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Kallerud, E., & Ramberg, I. (2002).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surveys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1(2), 113-124.

29. Espeland, W. N., & Sauder, M. (2007). Rankings and reactivity: How public measures recreate social worl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1), 1-40.

30. Marginson, S. (2014).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social sc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9(1), 45-59.

31. Siegel, H. (1988). **Educating Reason: Rationa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 Routledge.

32. Bourdieu, P.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3. Kitcher, P. (1993).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cience without Legend, Objectivity without Illu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 Douglas, H. (2009).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35. Frodeman, R. (2013). **Sustainable Knowledge: A Theory of Interdisciplinarity**. Palgrave Macmillan.

36. Miyazaki, H. (2013). **Arbitrating Japan: Dreams of Capitalism at the End of Fin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7. Zaloom, C. (2006). **Out of the Pits: Traders and Technology from Chicago t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8. Riles, A. (2011). **Collateral Knowledge: Legal Reasoning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 O'Neill, O. (2002). **A Question of Trust: The BBC Reith Lectures 200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 Porter, T. M.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Jasanoff, S. (2005). **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2. Gieryn, T. F. (1983).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 781-795.

43. Biagioli, M., & Lippman, A. (Eds.). (2020). **Gaming the Metrics: Misconduct and Manipul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MIT Press.

44. Muller, J. Z. (2018). **The Tyranny of Metr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5. Daston, L., & Galison, P. (2007). **Objectivity**. Zone Books.

致谢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受益于对知识社会学、组织研究和实用主义哲学文献的深入研读，以及多位匿名审稿专家的细致评审和建议。文中所有观点和可能存在的错误由作者本人负责。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无任何利益冲突。